



南京大學
NANJING UNIVERSITY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经济制度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葛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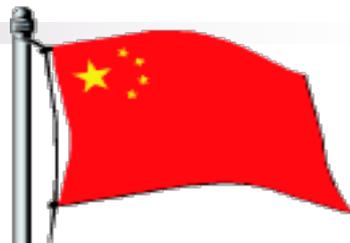
2024. 09



-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确定
- 二、改革开放与中国发展模式
-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确定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定性

我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们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那个阶段。它有科学的规定性:

第一,从社会性质来说,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



第二,从发育程度和发展水平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还存在诸多不相适应的部分,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第一层涵义阐明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

第二层涵义阐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不发达阶段。



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不能急于求成。





2. 确认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依据

首先，是由社会主义建立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从而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使我国的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和日臻完善。



其次，是由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条件决定的。

经过新中国后70多年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我国还没有完全摆脱贫穷落后的不发达状态，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完善的状况还未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来改变这种落后的现状，然后才能进入较高级的发展阶段。



第三，是由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决定的。我国已经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和综合国力，同当今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差距。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从不发达进入发达状态，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

世界经济版图发生的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快速变化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



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尤其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状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实现这个历史过程中的一系列转变，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



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

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国已经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正行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表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备了坚实基础和充分条件。新的社会主要矛盾



也表明，我们有条件、有能力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也是以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



3. 客观评价新中国70多年经济发展

70多年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两大时期，是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分界来划分的。对于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简单的全盘肯定和简单的全盘否定都是不可取的。

1978年，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是否定计划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是计划经济时代所创造的经济基础。

因此，否定计划经济不等于否定计划经济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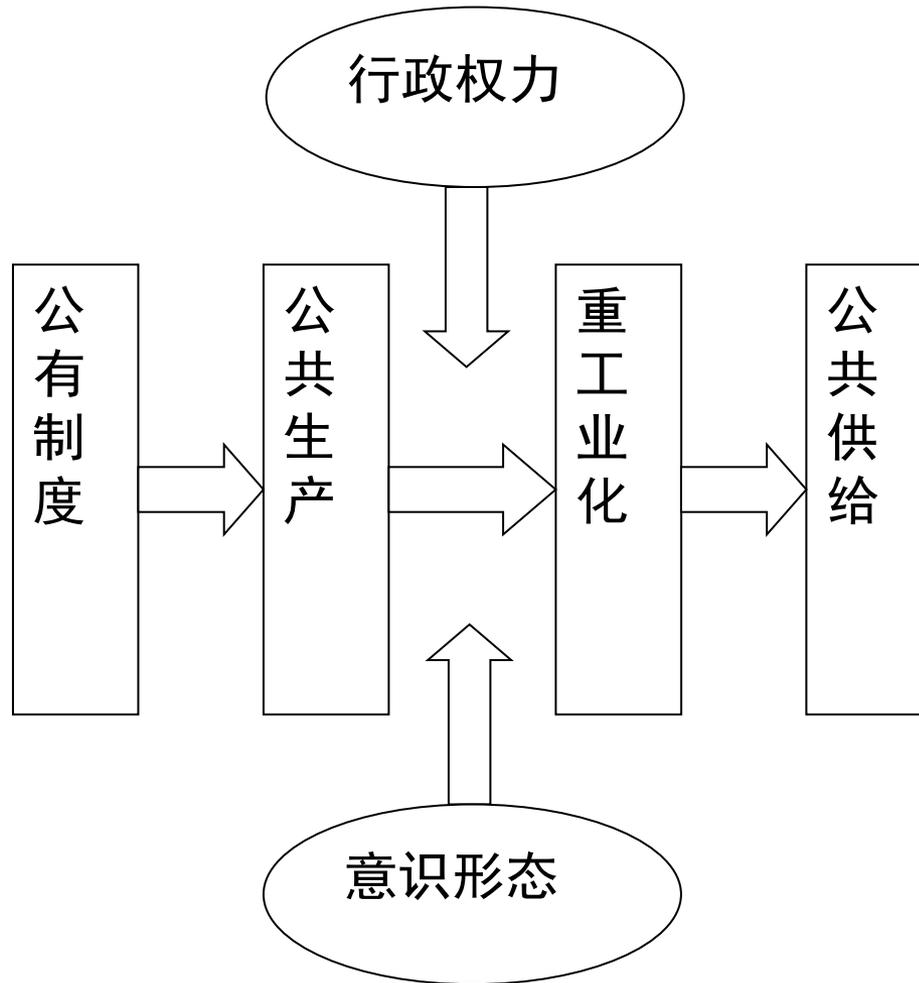


所创造的经济基础。

对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计划经济进行评价必须从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来进行。

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路径来看，公共供给型发展模式是一个基本特征。

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新中国的基本选择，而对当时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中国来说，要想较快地改变经济状况，不仅要以公共供给为取向，而且必须借助计划经济手段。





二、改革开放与中国发展模式

1.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

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发展民主，加强法制，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开放，主要指对外开放，在广泛意义上还包括对内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



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是我国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实际上是**双重转轨**的路径：一方面是从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一转轨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轨有大体一致的意义；另一方面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一转轨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轨的含义大体相同。

2020年我国GDP超百万亿。

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15986亿元

。



综合国力持续增强。2000年，我国经济总量迈上10万亿元台阶，2012年突破50万亿元，2020年又突破100万亿元。20年内，经济总量规模扩大至10倍，成就举世瞩目。

2020年

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2.3%**



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

由2019年的16.3%

上升到
17%
左右



货物进出口总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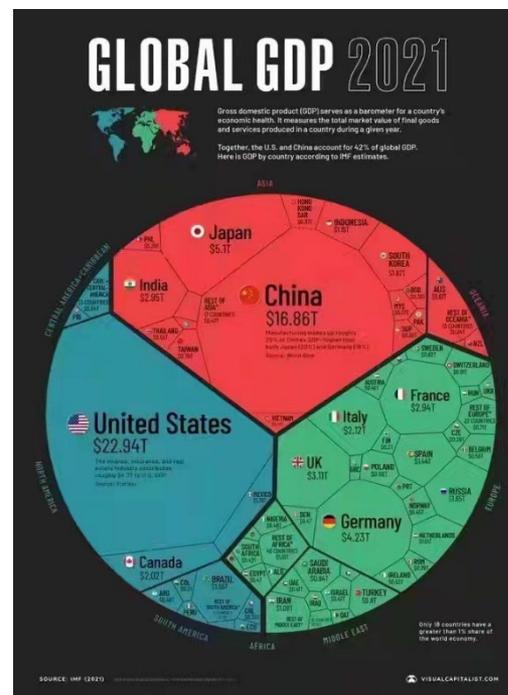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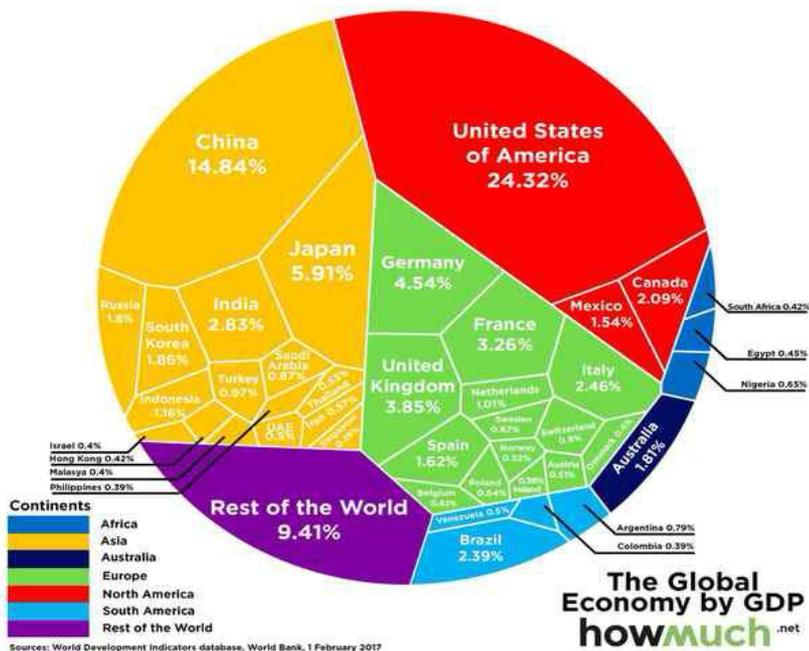
创历史新高

比上年增长**1.9%**





世界百年未有之经济力量大变局





不过，2022年我国GDP相当于美国的70%；2023年，我国GDP只有下降到美国的65.36%了，按照这个算法，中美之间的GDP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了。这里很大程度是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降的影响。

全球经济学界流传着“70%诅咒”，即当一个国家的GDP达到美国GDP的70%时，经济可能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状态。

其实，也不仅是中美GDP总量差距拉大，由于美元升值，大多数国家以美元计价的GDP都会减少。



2. 中国发展模式的特点

(1) 改革的政府推动型

政府推动型，是一种既非完全市场化，亦非完全政权化的特殊经济形式，是指在政府主导下，政权和市场相互作用的经济形式。

第一，资源动员的行政性。

资源的行政性配置不仅仅存在于资源结构性转移的“原始积累”过程之中，而且在企业再生产过程中，行政机构也直接介入。调节收入分配与使用，将企业的剩余集中起来用于扩大再生产



的再投资。

第二，行政权力制约下的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在经济转型时期，资源的配置又会接受市场信号的导向，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引导着行政机构的投资方向的决策，决定着产业结构选择。

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演进，反过来造成不同阶层政府投资决策的差异性。政府行政层级的高低，其行政目标的结构和次序不同，导致了投资决策行为的差异。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基层政府，随着行政级别的递减，投资的市场化倾向则增强。



(2) 改革的阶段性

中国改革的阶段性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制度创新过程；二是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创新过程。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展开的。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在当时中国的整个经济状态中，由于城市国有企业国家的政策保护而难有实质性的改革。

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开始就进行得相当顺利。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整体利益格局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中国经济从局部改革到整体改革是**通过存量**的**改进**实现的。所谓制度存量，既包括一些制度结构，也就是本质性的制度特征，也包括与这个制度必然相关联的表现特征。比如，价格双轨制形成。

同时，中国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依靠****体制外突破**和**增量改革**，并以此来促进旧体制的变革，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完全依靠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3) 改革的渐进式

中国选择了渐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摒弃了大规模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所谓震荡疗法。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誉。

渐进改革方式的具体运行机制就是两权分离。可以通过在保留国家对公有财产的所有权的基础上，把相应的其他权利进行合理分解并推向市场，通过其他权利的市场化实现经济参与人的激励兼容，盘活公有财产，达到保值增值的目标。

公有产权制度改革有两条主线；一是公有产



权制度结构的改革，即体制外的非国有制经济成份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壮大；二是公有产权制度实现形式的改革，即体制内的全民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因此，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在现实中表现为计划和市场两种力量相互转化的过程。

3. 关于“北京共识”思考

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



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

在雷默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



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雷默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在全世界产生涟漪效应。目前，中国已成为拉美和亚洲其他国家商品的重要进口国，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钢材、石油等市场的重要支撑力量。可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支持中国的增长，就是支持自身的增长。这种情况使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形成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1990），简单地说就是：“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由于上述三个国际银行总部都在华盛顿，约翰·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son）代表美国经济研究所出面邀请国际银行组织和拉美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进行研讨，达成一定共识，因而称作“华盛顿共识”。



对“华盛顿共识”的思考

新自由主义受到全球性的“讨伐”，曾经被诅咒为“敌人”、“灾难”，被称为“野蛮资本主义”、虚假的“同质性模式”。

辱骂和诅咒不能解决问题，新自由主义的困境唤起了发展中国家的理论觉醒。

1998年4月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智利首都提出“**圣地亚哥共识**”，内容包括减少改革的社会成本、加强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维护社会稳定、完善民主制度等主张。

波兰在1993年后的改革抛弃了“休克疗法”



的激进私有化方案，转向国有企业的商业化、竞争性政策和培育新兴私有部分，取得了的不小成就，被称为“没有休克的疗法”，得出的结论是：“休克疗法”是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理解，混淆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

“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更有力的挑战来自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1998年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它所倡导的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包括两个基本元素：改革的总体不确定性和互补性以及政治约束，就是



说要在改革的可接受性和改革的不可逆转性之间实现均衡，而非简单地比较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的优劣；它强调转型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强调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后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思想可归纳为：

一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技术引进或生产率提升，而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不是所谓自然发展途径所依赖的、建立在明确界定的生产函



数假设上的比较优势阶段论；

二是国家干预的必要性；

三是国家干预是配合市场而非取代市场。

后来还提出一个“孟买共识”。

美国的迈克尔·舒曼在《时代》周刊网站2010年10月29日发表了题为“印中比较：哪个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典范”的文章。

在减轻贫困、建设工业、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把经济实力转变成政治实力方面，中国都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纪录。中国的崛起让西方怀疑其所珍视的民主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原则是否



还站得住脚。一些人于是认为，中国倚重国家的、半市场性的经济——即“国家资本主义”——比较适合于满足现代世界的需要。建立在专注于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正在被“北京共识”所取代。

但是，北京共识是否真的是穷国有效的模式呢？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助理拉里·萨默斯在2010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印度的政治经济模式——他称之为“孟买共识”——可能会最终取得胜利。

也许到2040年，人们的讨论将较少地围绕“华盛顿共识”或“北京共识”，而较多地围绕



“孟买共识”——第三条道路，它不是基于已经被证明过时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思想，或者最终将被证明不会取得持久成功的资本主义思想，而是建立在民主发展式国家的思想基础上，不是受到从重商主义角度重视出口，而是受到以人为本地注重提高消费水平和扩大中产阶级的推动。

因此，哪个才是比较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孟买共识”还是“北京共识”？

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和两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间的比较中，印度通常以失败告终。印



度的经济增长一贯地落后于中国。印度根除贫困的速度不如中国快，即使印度实行追求经济增长改革的起步时间要比中国晚12年。这给印度的穷人带来了可能达到危险程度的失望情绪。印度竭力与中国在大型的、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方面竞争，其所吸引的外国投资不如中国多。

在实施政策或建设急需的基础设施方面，印度分裂的政府要比中国政府行动缓慢。只需把北京组织完善的2008年奥运会与新德里令人难堪的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相比较。



现代资本主义暴露五大缺陷：

首先，在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资本主义导致了异乎寻常的贫富分化。

其次，是医疗保健的提供和分配，医疗保健市场不符合对于确保经济效率的价格机制必不可少的多项基本要求——它首先让消费者难以评估他们所接受的治疗的质量。

这个问题将会变本加厉，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和老龄化，医疗保健费用在收入中所占比例无疑将会上升，在几十年内可能超过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30%。许多国家正在遭遇这样一个道德难题：如何在避免医疗服务获得方面出现巨大不平等的同时，维持对生产和消费的激励——这个问题在医疗保健领域的严重程度超过了在其他任何市场。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用公众运动敦促个人更加关心自己的健康，同时又培养着一个诱使众多消费者吃下极不健康食物的经济生态系统。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称，有34%的美国人肥胖。显然，常规尺度下的经济增长——意为增加消费——无法善始善终。



第三，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大幅低估后面几代人的福利需求。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这还从未成为过问题，因为技术进步持续带来的好处掩盖了短视的政策。基本上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比上一代重要很多，但随着世界人口超过70亿，资源紧张的预兆变得越来越明显，无法保证这一轨迹能够得到维持。

第四，金融波动，是导致深刻反思的问题。在金融世界，不断的技术创新并没有使风险显著降低，反而可能增加了风险。



第五，是把资本主义视作一种意识形态概念，而不是用来改善人类福祉的实用工具。艾伦·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是以下思想观念的最大受害者：市场总是知道得最清楚，因此没有必要对它们严加监管。这种信条在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破坏。不过没有一个亚洲社会深受其害。相反，亚洲人认为，缺乏良好的治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发展。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

(1) 社会主义所有制存在必然性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



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不是唯一的经济成分,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但为了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为了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第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多层次,与这种状况相适应,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我国公有制经济只能在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不能成为社会经济的唯一形



式,这就需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即在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提高。

第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已是我国现实经济中客观存在的事实。

(2) 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

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多样化以后,资金充足了,规模扩大了,机制灵活了,管理加强了,市场拓宽了,效益也提高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没有丢掉,而且更加巩固和加强了。因此,在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推进企业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进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深化集体企业改革，继续支持和帮助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的发展。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的一种公有制形式。

股份合作制是属于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



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股份合作经济，兼有股份制与合作制的经济特征。

股份制是一种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适应于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仅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成分和集体经济成分**。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



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实践证明，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也不意味着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越大越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具有控制力、影响力；

二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时，还必须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健康发展，以真正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个体经济是指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支配劳动产品的一种经济



形式。

私营经济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存在着雇佣关系的经济成分。在我国现阶段私营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外资经济是指在我国开办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所形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外商独资的企业，简称“三资企业”。





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非公有制经济产权清晰，机制比较灵活，能及时适应市场需要进行生产，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因而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对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品质量提高，有着积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有重要作用。坚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实行的正确政策。



(3)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探索，我们逐步寻找到“混合所有制”这种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产权特征决定了它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汇集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的特长，通过联合投资和联合经营，既扩大了资本实力，又激活了经营机制，是一种富有活力和效率的资本组织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要强调公有经济、非公有经济“两条腿”走路，这样才能走远、走好。当然，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



有制经济，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特质。

混合所有制的最早是由西方国家提出的，主要是指企业股权的混合状态，即各种所有制经济能够融为一体，形成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经济。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早就预言过，我们将迎来一个混合经济时代。混合所有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又反过来推动市场经济更大的发展。混合所有制具备单一所有制不具备的综合优势，它通过兼收并蓄，使不同经济成分通



过混合，互相渗透，实现扬长避短的互补效益，既包括各种所有制的优势互补，也包括各种经营方式的优势互补，还包括各种所有制所容纳的生产力方面的优势互补，从而发挥综合优势。混合所有制已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非常重要的组织形式。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作用：

混合所有制是以社会中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为前提，通过各类性质的产权在市场中以多种方式自主流动和重组形式，并适应竞争的需要不断变化所有制结构。

混合所有制把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结合起来，既包含了公有制经济，也包含了非公有制经济。只有



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才属于公有制经济。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能够找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符合客观社会经济现实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能够解决公有制产权制度的运行机制问题，实现资源配置的新的制度安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经济运行的活力，实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效益结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能够借助新的产权配置结构和企业运作形式，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条件下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实现国



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形成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企业运营的高效益。

。

混合所有制产权特征及优势有哪些？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财产权分属于不同性质所有者的经济形式。在宏观层次上，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在微观企业层次上，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股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正逐步形成和推行。



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具有开放性与兼容性的基本特征。第一，开放性。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可以吸纳各种所有制形式并从中产生出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在微观企业层面，混合所有制的典型形式股份制兼容了各种财产所有制，既包括国有控股的企业，也包括了民营资本控股的企业，促进了大规模财产组织的形成和规范运作。第二，兼容性。混合所有制能够兼容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发展出新的财产产权结构。无论在何种经济形态下，所有权运行的规律都是一种所有权对另一种所有权的排斥。这必然出现闲置经济要素的现象。而混



合所有制无疑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它的功能在于使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在一种更广的范围内实现了统一，从而创造了消除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对立的社会化产权的制度形式。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决定收入分配结构。从根本上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1) 按劳分配的地位及其实现形式

按劳分配是人类历史上分配制度的一场深刻革命，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条件决定的。

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的基本要求是：

第一、在全社会范围内，社会在对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必要的扣除之后，以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包括劳动数量和质量)为唯一的尺度分配个人消费品，实行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第二、按劳分配所依据的劳动排除任何客观因素如土地、机器等生产资料的影响，只包括劳动者自身脑力与体力的支出。

第三、作为分配尺度的劳动，既不是劳动者实际支出的个别劳动，也不是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而是劳动者在平均熟练程度和平均劳动强度下生产单位使用价值所耗费的社会平均劳动。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按劳分配的实现，要有一些前提条件，包括：



- 其一，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
- 其二，经济社会条件要能够保证劳动者各尽所能。
- 其三，商品经济已经消亡。
- 其四，社会可以统一对社会总产品做各项扣除。

不过，我们目前实行的按劳分配的方式同马克思当时的设想有着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点：

- 第一，按劳分配的主体不是社会，而是企业。
- 第二，按劳分配还不能直接以劳动时间为尺度，只能以商品交换实现的价值量为尺度。
- 第三，按劳分配不是以“劳动券”的形式，而用



商品货币的形式来表现。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种分配方式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无论是生产力的发达程度还是生产关系的完善程度都已差异，因此，个人收入分配既不能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也不能实行完全的按生产要素分配，而必须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分配方式，除了按劳



分配以外，还存在下面几种收入分配方式：

第一，按劳分配以外的劳动收入。这主要是指个体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民家庭收入。

第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收入。这是指在资经济和个人经济企业中工作的劳动者得到的工资收入。

第三，经营收入。是指各种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的收入。



第四，按资分配的收入。这是指凭借资本、资产的所有权获得的利息、股息、租金、红利等收入。

以上这些收入实际上实行的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信息、管理经验等。

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



实行这样的分配制度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要求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发展劳动、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市场，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利于调动社会广大成员的积极性，把分散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动员起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

(3) 贫富悬殊与“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此后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表现为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发展经济学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称为“贫困陷阱”，1000~3000美元称为“起飞阶段”，3000~5000美元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1万美元被看成高收入的门槛。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与之相对的是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它们分别花了12年和8年时间，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人均GDP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超过1000美元，成功突破“贫困陷阱”（我国在2003年才突破该陷阱），但是，经过四、五十年，几经反复，它们一直没有能够跨过1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经济徘徊停滞甚至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其一，经济增长乏力。表现在科技创新难度不断加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企业摩擦成本居高不下、资源消耗受到制约、外需拉动功能减弱、“未富先老”拖累经济发展、缺少全球知名品牌等。拉美国家在20世纪30、40年代一般都采用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本国工业，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到1980年代，拉美国家的比较优势丧失。



其二，民主乱象。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必须适应这种社会发展阶段，否则就会乱象丛生。中等收入国家普遍存在着民主乱象，阻挠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大步跨越泥泞沼泽。长期政局不稳，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影响。

其三，贫富分化首先表现在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上，尤其是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悬殊。贫富格局的成因错综复杂，至少有这样四个方面：每年创造财富的分配状况、财富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转移、个人存量财富的变化、个人和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



其四， 腐败多发。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垄断地位阻碍社会民主化和社会改革，导致社会腐败问题严重，一些国家，权力被金钱财富收买，整个社会被其控制操纵，人们的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完全被破坏。

其五， 过度城市化。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就好比船和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流（工业化）大小决定着船只（城市化）吨位，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遗憾的是，目前中等收入国家普遍存在着过度城市化现象，这种相互掣肘阻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



其六， 公共服务短缺。所谓公共服务是指在基本生存权、基本尊严和基本能力、基本健康需要方面政府给公民提供的基本保障。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严重短缺，教育、医疗、养老待遇主要取决于个人收入和个人投资回报，这就必然会加剧贫富分化，不利于和谐发展。

其七， 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其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产业发展高度依附发达国家；

其八， 宏观经济政策失误，造成了外债激增、经济大幅萎缩、资本外逃严重、失业率高等问题，经济发展几乎停滞甚至倒退。



其九，金融体系脆弱。金融体系脆弱的主要表现是银行业盈利空间不断减少、抵御信用风险能力逐年下降、对发展势头良好的中小企业不敢放贷、股市沦为劣质上市企业的“提款机”。金融体系脆弱的后果是：不但拖累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随时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总起来说，新兴经济体国家之所以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

在早期的经济“起飞阶段”，它们在经济等方



面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制度问题，在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以后，其积累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便会集中爆发，其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便会进入临界状态，若在这一阶段不能顺利地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就难以克服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矛盾，在宏观上就可能出现发展战略失误，其经济增长就会回落（俗称“撞墙”），并陷入经济徘徊和停滞的困境，若再受到外部冲击，其经济就会衰退。可见，经济体制转型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拉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值得我们重视。

近些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都在努力调整政策，促进经济政治体制转型，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一些拉美国家的人均GDP接近或者超过8000美元，离1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已经只有一步之遥。

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对社会经济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当一国经济发展忽视了下层民众利益，导致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时，这个庞大群体事实上



被排除在经济发展之外，而这个社会也因此而孕育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当社会上大多数人不能容忍这种状态时，这个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已经失去了稳定发展的条件，突破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几成“骑着自行车上月球”的闹剧。

根据联合国工发组织确定的标准，韩国在1970年代末已经成为典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当时，韩国的基尼系数为0.36，到1990年代末下降



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根据国际标准，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相对合理区间的基尼系数为0.3~0.4）这说明韩国的经济体制基本克服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而忽视下层民众利益”的制度弊端，因而能够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系列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韩国在完成经济“起飞”后，仅仅用了8年时间就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韩国人均GDP在1995年达到11779美元，突破



了1万美元大关，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负增长，1998年人均GDP急降到7724美元。韩国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促使经济复苏，到2000年人均GDP又恢复到11347美元，并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人均GDP为20591美元）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条件。

我国正步入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40多年以后，已经从高



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值得我们警惕。

未来一段时间，如果不能通过体制变革和转型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那么，贫富悬殊随后就会成为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典型的特征。相反，如果贫富悬殊问题得到解决，那就意味着体制变革和转型得以实现，意味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条件已经具备，中华民族真正走向共同富裕的梦想也可以成真。

唯有锐意改革，促进经济体制变革并转型，



才能解除魔咒，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上所有现代化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从而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庞大的中产阶级对社会贫富分化具有较强的调节功能，对社会利益冲突也具有较强的缓冲功能，因而能够长期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要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首要的一条就是，该国的经济体制能够克服“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



益而忽视下层民众利益”的制度弊端，从根本上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路径：

其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衬衫换飞机贸易”能使两国经济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吗？不可能。只有彻底变革经济模式，改变过去发展经济的那种路径依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通过制度创新释放经济活力、依靠产业升级来创造经济奇迹，才有可能冲出陷阱。

其二，根本调整收入分配。要想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必须彻底改革分配机制，在数量上增加人均收入，在结构上改变分配不公。政府对此责无旁贷，并且这项工作也只能靠政府来做。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把钱合理的分别装进不同口袋。

其三，着力化解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是最大的政治。古人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意思是说，百姓生活的根基在于勤劳，只要勤劳就不会缺衣少食；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百姓是勤劳的，政府就应当确保他们的生活富足有余，否



则就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其四，坚决缩小贫富差距。缩小贫富差距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拉低高收入群体的畸高收入，当然这主要靠打破经济垄断、打压利益集团来实现；二是大幅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是后者。

其五，铲除灰色收入。在各种各样的灰色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公职人员工资以外所收取的感谢费、劳务费、辛苦费、补贴等，是机构、



职务、岗位公权寻租或权钱交易的表现。任何收入都应当非“白”即“黑”，不该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灰色收入。

其六，彻底根治“三农”问题。毛泽东说，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农民问题是我国的根本问题，也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彻底根治“三农”问题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而彻底根治“三农”问题的关键，就是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

其七，建立良好企业生态。企业是经济的细胞，它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受特定环境因素的影响。



响。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保持经济快速持续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须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依靠有效竞争而不是有害行为来赢得发展和社会尊重。

其八，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现代化的主要价值准则之一，包括机会平等、过程平等、结果平等诸方面，其中尤其是机会平等更重要。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才有尊严可言，社会才能健康发展。真正的公平，定建立在有效市场机制、合理政策机制的基础之上。

(4) 解决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经济学上的效率，可以用经济活动中所消耗的劳动数量、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的比率来度量。如果所消耗的劳动量少，取得的劳动成果多，则经济活动效率高；如果所消耗的劳动量多，取得的劳动成果少，则经济活动的效率低。

所谓公平，主要是指一定社会中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生活中，无论是劳动者还是生产要素的投入者，在收入分配过程中都应遵守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的原则，并允许合理拉开差距，防止两极分



化。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念是追求社会全体成员实现共同富裕。

效率和公平存在着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只有通过提高效率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人们才有可能去实现分配的公平；另一方面，公平又是提高效率的前提，只有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才能激发劳动者和生产要素的投入者尽可能全面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有助于效率的提高，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加物质财富，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

在分配制度问题上必须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



系，我们在效率和公平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有过三次转变。第一次转变，是在强调提高效率基础上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提高工作效率，打破平均主义。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第二次转变，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从而由“兼顾效率与公平”转变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坚持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础上强调，“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报告关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方面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第三次转变，再次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和公平的统一，还要建立具体的分配体制机制，进行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发挥好按要素分配的优



势；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根据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精神，要在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基础上，**建立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相互作用的体制机制**。初次分配即第一次分配，是依据市场机制、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再次分配即第二次分配，是政府根据公平和效率统一的原则，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支出等调节手段对财富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发挥道德的力量，在个人自愿捐赠前提下进行的公益慈善性分配。



收入差距趋向合理的措施：

(1) 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2) 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坚决依法惩处。

(3) 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种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

(4) 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一条根本的经验就是不断调整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界各个学派争论的焦点。尽管西方经济学派别林立，但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主张只有两个：一个是经济自由主义，一个是国家干预主义。从市场机制运行的角度来看，上述两种主张的对立贯穿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整个过程，大致经历了“国家干预（重商主义）——经济自由（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经济自由（新自由主义）——国家干预（新凯恩斯主义）”



的运动轨迹。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种主张对立的背后存在着“被动而为之”的共同点。西方国家采取“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完全是根据各自国家经济走势而被动采取的“钟摆式”运动。当经济运行相对稳定时，经济自由主义就开始摆起，相反，当经济运行出现波动甚至危机时，国家干预主义就会摆起。尽管“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和假设前提不同，但他们在理论逻辑框架上具有内在统一性



，具有共同的理论逻辑的制度前提，即私有制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作为国家干预主义集大成者的凯恩斯本人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强调国家干预并不反对自由市场，只是反对“自由放任”。

从本质上说，“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进行国家干预，而是怎样进行国家干预。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国家或者政府始终摆脱不了“守夜人”的角色，只是在经济出现波动时需要其出来“救场”的权宜之计。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既不是被动而为之，也不是简单强调一方而弱化另一方，而是科学界定二者的边界和职能，这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在明确市场和政府各自边界的基础上，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凡属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要简政放权，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也切实履行职责，该管的事一定要管



好、管到位，管出水平。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大市场、小政府”或者“强市场、弱政府”，而是要在“有为”和“有效”中寻找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结合点，实现“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2) 公共物品供给与政府职能

在现代社会，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最为主要和重要的社会职能。公共物品是由政府预算提供的，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为目的的，必然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消费的产品和劳务的总称。它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国防、外交、司法、公共安全、经济调节等纯公共物品，又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国民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公共卫生与医疗保健、公共文化设施、公共工程、资源与环境保护、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准公共



物品。

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消费，意味着政府参与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其目的在于在既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条件约束下，保证经济和社会在一定秩序中的正常运转，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物品的存在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也是政府存在的客观基础和充分条件。公共物品在其作用和性质上，与建立在等价交换原则基础上的、具有排他性财产权利的私人物品



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它的供给目的不在于谋求个人和团体的利益最大化，而在于追求社会效益的优化。因而，凭借价格变动来调节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对公共物品不发生作用或作用甚微。或者说，市场机制在公共领域失灵。因此，私人或者自利性组织不愿意也不可能生产公共物品。

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政府必须而且应该承担起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以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供给缺陷。这样，政府就成为生产或组织生产公共物品并供给社会需求的唯一或重要的担当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公共物品的比重有了很大的增长，政府是否应当提供公共物品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提供公共物品日益成为各国面对的重要问题。在我国，解决好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消费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而有效运行的充分必要条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社会形态下，社会公共需求的内容和程度是不相同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公共



需要的满足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公共财政的财力基础，另一方面又为社会经济制度和管理阶层的意志所决定。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尚不发达，因而在公共物品的供给程度上不应与发达国家攀比，但在供给范围上应当涵概公共物品的基本外延。特别是那些刚性很强的公共需求（诸如教育、医疗、失业救济、就业扶助、养老保险、基本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较强推动作用的公共物品（诸如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础研究、某些



基础设施、司法制度等），应当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优先保障供给。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原则的应有体现。

（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其一，社会保障及其作用。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特别是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人们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

现代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包括的内容有：即



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

其作用在于：其一，维护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其二，调节社会经济关系；其三，维护社会安定。

其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

。

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以城镇职工为主，以单位保障为主，实行广就业、低工资辅之以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及住房福利等）的模式。这种模式是适应



当时的经济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存在问题。

一是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制约保障功能的发挥。

二是社会保障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国家和企业不堪重负。

三是社会保障缺乏统一管理，基金运转处于无序状态。

四是基金收缴困难，影响社会保障工作的正常运转。



五是社会保障尚未纳入市场化、法制化运行的轨道。

（4）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思路。

其一，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逐步推进和完善社会保障。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费率要适度。

其二，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不能重城市轻农村，二是不能实行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其三，发挥财政在社会保障中的重要作用。一



是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二是加强对社会保障节余资金的管理；三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财务会计制度；四是开征社会保障税。

（5）城市社会保障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一，进一步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扩大范围；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

第二，进一步深化失业保险制度改革。拓宽范围；收缴失业保险费；合理确定发放标准和期限；搞好再就业工程。



第三，进一步推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第四，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